

◆ 中國史學發微

◆ 讀史隨劄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32

錢賓四先生全集

◆ 中國史學發微
◆ 讀史隨劄

聯經



A89015

錢賓四先生全集 ③

中國史學發微

錢 穆 著



出版說明

本書少部分爲錢賓四先生較早之著作，大部分爲其晚年所發表有關史學之精要綱領。史籍浩繁，尤如中國二十五史乃至三通、九通，數說無窮；本書則屬提綱挈領、探本窮源之作，所爲極簡要而玄通。讀者即係初學，可以由此得其門戶；中人可以得其道路；老成可以得其歸極。要之，可以人人有得，隨所造詣，各有會通。

是書初編於民國七十六年，共收文十四篇。七十八年三月，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其第三篇史學導言，原爲五十九年先生應臺南成功大學羅雲平校長之邀，分別在元月六、八、十二、十四日爲該校所作四次公開講演之講辭。事後由錢夫人胡美琦女士根據錄音帶逐字逐句寫出，再經先生刪潤。是年三月間在臺北中央日報分期刊載，五月中央日報社出版單行本。是書既已收入本書，故今全集不再重出爲一書。又第十一篇莊子薪盡火傳釋義，先生生前已移入舊著莊老通辨

中。今編全集，亦不再重收此篇。則本書共得文十三篇。

此次整理，係以初版本爲底本，校改原書若干誤植文字，並整理標點符號，主要爲加入私名號、書名號及重點引號，以便讀者閱讀。整理排校雖力求慎重，然錯誤疏漏，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賀廣如小姐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一

中國學業相傳，向分經、史、子、集四部。經學最早，但實惟有詩、書兩部。詩三百迄今猶存。書則惟商、周兩代少數幾篇政治文件，或最先當起於盤庚以後。至唐、虞、夏代，如堯典、禹貢之類，皆出戰國後人撰寫，非孔子前所有。至於禮，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則禮非成書，故稱「執禮」，與詩、書不同。儀禮僅屬士禮，乃孔子以下人所造。周官更屬後起，當在戰國之晚世，或當在虞夏書之後。樂則無專書記載。即孔子時，鄭、衛之聲，已非古樂。孔子在齊聞韶，韶樂乃自陳達齊，但亦決非傳自舜代。惟在孔子時，已屬南方之樂之稍古僅存者。至孟子時，古樂、今樂已顯相分別。易雖古代相傳，但孔子時亦僅爲一卜筮之書。易傳則當出秦始皇時代，已雜采儒、道兩家義成書。孔子前雖有詩、書，亦不稱之爲「經」。蓋古代學術尚未流通，惟政府最高層始掌有之。故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學術傳於社會下層，其事始於孔子。戰國諸子著書，墨家最先有經。漢代諸儒以孔門相傳有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學，遂誤稱「六經」。而實是詩、書、儀禮、周易及孔子春秋，只五書，尚缺一樂經。漢武帝乃立五經博士。後代經學惟五經有傳記注疏，此外不再有增。則雖有經學之名，而其學術相傳，則惟傳述，無創作，與史、子、集三部有不同。

先秦諸子相傳爲九流十家，最先起者爲孔門儒家。孔子爲中國自古相傳私人講學之始，前後門弟子共七十七人，後世譌稱七十二人。然姓字見於論語者，不達半數。論語乃孔門師弟子相聚講論語言之記載。然其書相傳，至孟子後，始正式編纂爲上下二十篇。故在孟子書中，亦尙不見論語一書名。墨翟繼孔子而起，但墨家先有成書。如今傳墨子及墨經，其書皆出論語爲書行世前。其他各家成書，則全出儒、墨後。但獨有小說一家，則其成書當尙有在孔子之前者。

九流各成一家之言，以其門弟子相聚相傳，如同屬一家，故稱「家言」。家族之「家」，指血統言。諸子成「家」，乃指其所講貫之道統言。獨小說家則不然，因小說家所彙集之諸書，尙遠起在孔子儒家講學之前。古代有史官，由周天子分派於列國諸侯間，世襲其位。又有正史、稗史之別。「正史」居諸侯之國都，「稗史」則散居國都外城鄉間。其有關稗史所記載之文字，散見於今傳左傳諸書中者，尙不少。余已在他篇論及，此不詳。戰國小說家言，則即由其時之稗史

來。

如是則在子學中，豈不即包涵有史學？其實不止於此，即如縱橫家言，豈非即戰國時代有關當前國際事件一種互相分派之爭論與抗議？其實尙不止此，即如孔子爲儒家開山，但「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則孔子之意，乃欲上承周公。後儒則又自周公上推堯、舜、禹、湯、文、武之唐、虞、三代。墨翟繼孔子起，自爲家言，則曰：「非大禹之道，不足以爲墨。」是墨家於唐、虞、三代中，獨取夏禹一人爲法。道家繼儒、墨而起，乃更上推黃帝，而唐、虞、三代皆在其下。但又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創爲農家言。其次如陰陽家，則庖犧氏、神農氏、黃帝、堯、舜以至三代，凡中國史歷古相傳諸帝王，皆在網羅取法之中。而秦之統一，則其君自稱始皇帝，是亦上承雜家呂不韋春秋十二紀來。則凡先秦諸子學，實可謂乃無一而非源自史學。

此後漢代史學繼起，其太史官司馬談討論六家要旨，而私意所宗，則更在道家。其子司馬遷繼之，乃益尊儒家，故既爲孔子世家，又作孔子弟子列傳與孟荀列傳，於諸子中最爲特出。其自序則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是史遷之爲史，亦求上承諸子立言成家。則子、史之學，自古人視之，其間實無大分別。此後二十五史以及三通

諸書，乃亦如諸子，各成家言。尤可以宋代之歐陽修爲之例。如此中國之子學與史學，豈不貌分而神合，可離而可通乎？

再次言及集部。集部有駢、散之分。最先駢體肇始於屈原之離騷。詩、騷並言，則離騷亦可謂乃上自經來。太史公以屈原與賈生並傳，賈誼治安策乃漢初一名奏議，則離騷豈不亦可通於子與史？其下乃有三國時代之建安文學，乃始由西漢自離騷轉爲駢體辭賦，又轉入散文中來。如曹操之奏議詔令，皆可納入文學之集部。諸葛亮出師表，亦入集部。實則此等文字，皆亦子亦史。又如晉宋時代之陶潛，其所爲詩辭傳記，如歸去來辭，如桃花源記諸文，皆即其一人之史，亦即其一家之言，豈不史與子與集之三部，實可通而爲一乎？

唐代韓昌黎唱爲古文，乃始正式由駢變而爲散。其自言：「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則其言亦子亦史。一人之集，至少乃爲其一人之自傳，亦即當歸入一民族一國家之文化道統中。故集部興起，乃爲四部之最後。其實古代之經，如詩、書，尤其如古詩三百首，豈不亦如後代文學一集部？亦可謂集部即是子，但較單純而已。而其當可列入史部，則更不待論。是則中國四部之學，其實約略言之，只是子、史之兩部分。孔子作春秋，又與其門弟子所言合成一論語。春秋經而即史，而論語是子，但亦可稱爲一集部。是則孔子一身已兼有了四部之學，故後人尊之爲「至

聖先師」。

此下於四部之學最有完整成就者，當推北宋時代之歐陽修。其生平著述，可謂經、史、子、集四部皆備。如其爲新五代史，乃史部之正宗。又兼修新唐書，亦入二十五史中。而其於經學，皆有成書。其於詩經方面姑不論。其於易經，疑易傳非孔子之作，此乃自孔子以來，一千年後始發其議。歐陽子自謂再歷一千年又有第二人，兩千年可得第三人，三人爲眾，則此一人所疑，二千年後，即當成爲眾人之所疑矣。此其運思持論，何等高明而廣大，悠久而深沈。可見由一人之學而成爲家學，由一家之學而成爲千古之羣學，即道統所存，即於歐陽修一人之身，亦已明白暴露無疑矣。

又歐陽修之文，上承韓愈。而其闢佛，則成爲本論。以一人之所疑、所反對，化而爲全國之政教，此即由集爲子一明證。故由歐陽一人，而中國四部之學之可得達成於一家，亦即明白可證矣。

余此書專爲史學發微。苟其人不通四部之學，不能通古今之變而成其一家之言，又何得成爲一史家。上之如漢代之司馬遷，後之如宋代之歐陽修，皆可爲明證。惟孔子則尤其爲至聖先師，爲一切中國學人之最高楷模。此則治中國學術，皆當以此爲法。此非空言，乃實際標準之所在，

則尤貴學者之能深思而明辨之。心知其意斯可矣，又何貴於繁言與空論。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一月錢穆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有三

序 二

西方人重空間觀，但缺時間觀。古希臘人即有幾何學，作航海測量之用，但幾何學非以測時間。中國古人，則立標測日影，即知重時間。又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雄鷄司晨，亦以測時間爲重。

阿剌伯人有天方夜譚，其間有「能言鳥」一故事。三兄弟同求能言鳥，兩兄已失蹤，其弟繼續追求。一術士告之，循山路上行，路旁有呼聲，勿回顧，則能言鳥易得。其弟乃塞耳上山。路旁叢石聳立，呼喝不已，愈上則石愈多，聲愈大。其弟因已塞兩耳，幸能終不回顧。竟得能言鳥所在，取之以歸。路旁石皆起立重得爲人。蓋皆來尋能言鳥者，聞聲回顧，遂化成石。此亦如人讀史，過重以往，乃隨前人過去，亦如失敗，無以向前。歷史乃前人一切以往故事，可稱已均屬失敗。回讀史籍，亦如人重蹈覆轍，自陷深淵，重歸失敗。能言鳥故事即此意。古希臘濱海而

居，非出國渡海，遠向他邦，即無以經商，亦即無以爲生。阿剌伯人居沙漠中，非渡越此沙漠，生命亦無前途。故此兩種人，多主向前，不重回顧。歷史故事皆屬以往，非彼輩所當流連。

耶穌則猶太人，其創始宗教，乃謂人生從天堂降謫，死後將重返天堂，俾得安居。愷撒事愷撒管，歷史則屬人間事，全屬愷撒，爲上帝所不管。信奉宗教，自不留心歷史。

西方文化會合此輕視歷史之三大淵源，遂無史學可言。

中國人則謂：「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前人隨時過失，後人即當警戒。並且前世以往亦並非無成功之處，亦可資後人以承襲與模仿。歷史教人向前，即因其能知過善改，亦因其能善所承襲。西漢人言：「自古無不亡之國。」其時則中國歷史已歷兩千年以上，伏羲、神農、黃帝以迄唐、虞、夏、商、周，以至秦漢，一部兩千年以上之歷史，豈不告人以人類已往，歷史有得有失，有成有敗，使人知所警惕，有過能改。則過而常存，去而復來，乃得依然向前。人生遂能發出前所未有之聰明與措施，而改善其將來。如此則歷史所記乃人道，實亦即天道。人類智識貴在此不斷過程中，求獲將來之新得。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如人一日三餐，有排泄，但亦有存留。惟其所存留已非故物，因謂之「化」。化則非屬過去，故曰所存者「神」。莊周言：「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

天下一氣耳。」是則歷史非盡屬過去，乃成一種神化作用。西方人輕視歷史，則過去盡成臭腐，如希臘，如羅馬，乃至如近代之英法，不久亦當全成爲臭腐。而中國則上下五千年通爲一體，盡成神奇。此豈西方之所有。人文學中之史學，其功用乃如是。

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必經以往過失，始得繼續生存。孔子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過去與將來，即屬人生之兩端。當前現在，則是其中。歷史可貴處，即在其屬於過去之一端。不斷過失，實亦爲不斷存在之前因。即在此過失中，求一不斷之嚮往。儼盡放棄其一切過去於不顧，則此端既不存在，亦即無其他一端可言。既無過去，亦即無將來，更又何從尋得一向前之生路？中國人言「死生」「存亡」，此即兩端。不死又何有生？不亡亦何有存？

中國人又言「道」字。道即一條路，向前一步，則失去了其走過之一步。其實就其不斷向前言，則一步過去，亦即是一步完成，但當求前途之所止。而人生無窮，則其前途亦無止。故步步向前，非只是步步過去，實亦是步步完成。人類歷史正如此。司馬遷引詩以讚孔子曰：「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此見人類遠大成功之一境，亦即無可至、不能止之一境。而「景行行之」之逐一步驟，則亦盡在逐步向前之途上。即過失，亦進步，同時亦即是完成。此則中國人之歷史觀。

余嘗謂人生即歷史。人生之最要過程在能知過勿憚改。歷史亦然。孔子時時夢見周公，但其老年則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周公在孔子當時，實已成爲一過去人物，亦可謂一失敗人物。儻周公不過去、不失敗，則周室亦不東遷。故孔子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則孔子已知周公當年之道不復可行於孔子之時矣。孔子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亦如周禮能言，而魯不足徵。其言不足徵，即猶言過去之亡失。但亡失者乃其事，非其道。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杞、宋不足徵，即夏、殷兩代已在過失中。魯不足徵，即周公與西周亦盡在過失中。其或繼周者，有繼周而起，此即「自古無不亡之國」之先聲。歷史在過去中，乃指其事，非言其道。而人生則貴在有將來。但非有過去，又何得有將來？是則歷史即人生，但可謂乃指其前半之已過已失言，非指後半常存常在之將來言。而將來之可知，則即在過去中。雖可知而不可知，雖不可知而仍可。此則讀史而明其道乃可知。故人道即天道。

當前之中國，或可謂孔子已先知之。所以孔子往日之所言，至今仍有可用。以今日世界之情況言，亦可謂早在孔子之預見中。然而孔子之在今，豈不亦已成爲一過去人物？孔子之所言，迄今已兩千年，早已過去，又豈得一一有用？是則貴在傳孔子之道者，斟酌而善行之。果尙求爲東

周，則盡人而明知其非矣。但此孔家店，則仍然不得打倒。此則當前之中國人，又誰歟能深識其意旨之所在？

知過去乃知將來，知亡失乃知存在。西方人不肯認有過，又不喜言亡失，故不愛言歷史。其所言之歷史，則盡屬成功一方面，如言希臘史、羅馬史，以迄於最近之英法史，當前之美蘇史，莫不皆然。使人僅見有當前之形成，而不見有以往之過失。則試問個人人生又焉得僅有生存，而無死亡？西方之耶穌教言人死仍有靈魂上天堂，則正是此義。

中國人貴能知過，又貴能改過，故其言歷史亦常在言人生之過失處。知得人生已往之過失，則亦易知當前及將來之所得完成。西方人則僅知此一端，不知彼一端。如羅馬人，僅言已是，不言希臘人之過失處。現世英法人亦僅言已是，而亦不言以往羅馬人之過失處。即如當前之美蘇，亦僅能各言已是，而不能言英法已成過去之一切前非。但美蘇自己不遠將來，亦將自陷於過失中。故西方乃終不能有其如中國般之史學，乃使其人生常陷於過失中，而不能自拔。

孔子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僅生七十二歲，但至七十始能從心所欲，而不見有過失。則其前七十年，豈不亦常在過失中？故孔子「學不厭」，即學求其少過。但中國亦僅有孔子一人爲至聖先師，則其他人亦盡不如孔子，斯其畢生多過可知。學史功夫即在知過。孔子作